

主編 李天綱  
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  
民國西學要籍漢譯文獻·哲學（第一輯）

Philosophy of Social Progress

# 社会进步的哲学

烏爾韋克(C.J. Urwick)著 黃卓生 譯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哲学（第一辑）

Philosophy of Social Progress

# 社会进步的哲学

乌尔韦克 (C.J.Urwick) 著 黄卓生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进步的哲学/李天纲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哲学)

ISBN 978-7-5520-1813-4

I. ①社… II. ①李… III. ①社会哲学 IV. ①B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2921号

## 社会进步的哲学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

电话总机021-63315900 销售热线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mailto: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印 张: 16.25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813-4/B.210

定价: 82.00元(精装)

#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去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细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2016年3月20日，于阳光新景寓所

烏爾韋克 (C.J. Urick) 著 黃卓生 譯

# 社會進步的哲學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初版

# 社會進步的哲學

## 導言 社會科學與社會哲學

社會學有時被人視為社會現象的科學。社會現象這個名詞的範圍很廣。他包括人類——魯賓孫除外——一切的感覺，思想，遭遇，行為，欲望或事業。我們之所以要將魯賓孫除外，就是因為我們只要注意真正的社會事業。至於一般獨立的自我的事業，却不是我們所要討論的。雖然如此我們所要研究的範圍還是很廣，因為各種事業，只要能影響他人，或被他人所影響，就是社會事業。我的思想，與我的頭痛一樣，本來不是社會現象；但是如果我將我的思想當衆宣佈，或是請醫生來治我的頭痛，或使我的家庭因這兩種東西而發生煩惱，那麼，他們就立刻成為社會現象了。我的忿怒，恐懼，或幻想，本來不是社會現象。但是如果我在許多社會份子中間表示我的忿怒，或將我的幻想傳佈到一個社會團體的各份子方面去，那麼，我的忿怒和幻想又成為社會現象了。發生戀愛，改變信條，乃是個人的事業，無論如何，至少開始的時候是如此，一部分是如此。但是當戀愛與信仰超過個人的心境以外的時候，他們就成了社會現象了；並且他們的由

來也是社會的。只要我的希望和志向是我自己的，那麼，社會學家與他們決沒有關係；但是我的希望和志向並不僅僅是我自己的；只要他們是從其他的人那兒得來的，並且足以影響其他的人，那麼，他們就是社會學家所研究的東西。甚至身體上的痛苦，雖然在表面上似乎完全是我自己的東西，然而社會學家也許要從事研究他們，因為他們有一種趨勢，可以使其他的社會份子發生痛苦；頭痛和牙痛的增減，也許如同癲症和犯罪的增減一樣都是社會事實。在事實上，人類生活中沒有一件事不是社會進程的一部份，沒有一件事不重要的；所以你我生活中各種事實，社會學家都可以用來形成他的結論。這就是社會學，或社會現象學的範圍。但是我們在那種意義上把他當作一種科學呢？我們當然不能在普通的意義上把他當作科學，因為科學必須把他本身加以限制，或作抽象的研究，俾能求得某種原因和結果的關係。科學所研究的那些物質的、生命的、或心理的現象，可以受這種限制，可以作抽象的研究；我們可以把他們分爲各種不同的種類，來作一種科學的分析研究，而不至使他們失掉他們的價值。天文學家致查星辰的時候，可以不必注意任何政治問題；氣象學家可以研究颶風的行程，不必管他是否防礙我們的假期。我們對於社會現象或社會生活的事實，也可以作抽象的研究，也可以把他們分爲一定的種類，不過方法不同罷了。我們一經抽象他們，他們就失掉去全部或部分的價值或特徵，這種價值或特徵乃是我們所要致查的、解釋的。每種社會事實無數的原因的結果，這些原因都是在一種極端複雜的狀況中一塊兒工作；我們很難將這種

事實和他的複雜的原因分開因爲如此，他就失掉了他的真正的意義——社會事實的意義。社會現象與真正科學所研究的現象有許多重要的區別。這就是其中的一種。真正科學所研究的現象是很容易研究的，他的原因是有限的；祇要將他和幾個有限的重要原因聯結起來，我們就可以解釋一切我們所要解釋的東西。我們可以用科學方法來研究氣候，不必注意社會的行爲和感覺；我們在雨天是否到禮拜堂中去，這種事情，氣象學者是不管的。但是如果我們不常常研究氣候，我們就不能解釋社會的行爲和感覺。日月的運行，草木的發育，與人類生活及其競爭完全是沒有關係的。但是人類的發育和運轉總是不免受制於日月的行動與草木的生活。所以社會事實與暴雨，彗星，菜蔬的發育，完全是不同的；如果我們要對於社會事實要解釋我們所要解釋的，那麼，我們必須同時研究環境中的一切的原素，有生機的和無生機的，社會的和非社會的原素。然而這些原素裏面有許多還是我們的觀察所不能及的。社會事實的社會環境尤其是如此。縱然我們能够將其他科學所研究的現象置之不顧，然而對於支配社會事實的社會生活中的任何原素，我們無論如何是不能不管的。那就是說：除非我們將社會事實在他和社會生活中的一切的原素的關係上來研究，我們就不能知道他的價值、意義，及其真正的特徵。

可是也有幾種社會現象，可以拿來抽象。分開來單獨研究的，如同物質宇宙中的各種現象可以分開，獨立成爲一種科學一樣。

比如我們可以單獨的研究生育與人口的增加的問題，研究人口的健康與否，藉以得到一種有實際價值的科學的因果知識；現在的優生學就是如此。或者我們也可以單獨的研究生財的事實，生產與交易的事實，現在的經濟學就是如此；或者我們也可以單獨的討論人羣的同情和仇視，感覺和戀念，現在的社會生理學就是如此。每個部分都成一種獨立的社會科學；每種社會科學，在他自己的正當的範圍以內，都是很有價值的。還有一樣很重要而且很有用的知識是我們必須有的，即就是我們必須知道某種心理的原素是能够遺傳的，並且也要知道兒童的健康，大部分要依賴父母和遺傳的某種條件。我們應當知道：普通一般爲生計或財富而工作的人，如果他們能够採用協力的或自由交易的方法，那麼，他的生產一定可以增多；這種協力和自由交易是要受於一定的條件的支配的。但是世上沒有一種社會現象的社會科學對於我們的行爲能够指示一種最後而且最好的方法。每種社會科學都能給與我們小小的幫助；但是無論什麼科學都不能告訴我們怎樣才有良好的生活。我們都知道：現時的各種獨立科學都不能完滿研究這種問題。社會現象和社會事業的種類，是由我們人類自由決定的，我們要有多少，就有多少，他們的重要各有不同，然而都是重要的。我們由他們中間選擇幾種，爲他們設立幾種特別的科學，細心的研究他們，這就是因爲我們覺得他們在現時是很重要的。前面所說的生財和衛生的科學就是這樣成立的。但是我們的社會生活是由許多枝葉組合而成的；他們完全是重要的，顯著的，與社會幸福都是有關係的。感覺信仰，

和志向的改變乃是人類幸福中的重要原素。他們的重要是和人口與財富的質量的改變同等的；他們都是不停的在社會進程中共同工作。在每個專門的社會科學家眼光中，他自己所研究的東西和所發現的定律是最重要的；他至少是相信：除非他所研究的那些事實是真正重要的，那麼，社會本能決不會將他們選擇出來，把他們當作重要的東西。可是優生學者、經濟學者或任何其他專門學者所研究的，只是一個無限複雜的全體的一小部分；他所知道的還是受制於無人知道那些東西。他對於「我們必須怎樣才能有良的生活」這個問題的答復，只是一種暗示，這種暗示我們必須細心的估量；這並不是什麼科學的定律，無論如何必須服從的。

我們之所以要指明社會學和社會科學的這種限制，第一就是要使讀者對於他們不能希望過奢，並且同時要使讀者知道：社會生活的哲學是怎樣的將我們帶到科學的範圍以外去。科學的天職就是研究無定的程序；研究一切可能發現的程序，把他所發現的東西制成定律，使我們能盡量的應用他們。但是哲學所討論的乃是這些程序的特徵，研究他們的結果和美滿的人生的關係。人類的各種事業都可以用科學來討論，這種討論對於我們有用的知識多少都可以增加一點；但是如果人類的活動是我們實現理想人生的一部分的努力，那麼，這些活動決不能用科學來解釋，因為這些活動的特性是我們的理想給與他的。社會科學就是要解釋他們；因此我們將社會哲學與科學分開，將他與宗教聯結起來；因為對於人生的

主要計畫和主要目的，有一種堅決的概念；他的中心點就是理論主義；他的主要原素就是堅持着天國的理想；他一切的理論，他一切的因果關係的連繫以及變遷的分類，都是根據因果律而進行的，並且始終都根據他的理想精神和目的而進行的。

這種社會哲學的定義，可以表示社會哲學與社會學的區別。社會哲學乃是一種試圖，把社會現象當作一種有秩序的程序或系統，這種系統或程序是受制於一種目的，並且從這種目的獲得他的全部及各部的真正的特徵。但是社會哲學決沒有武斷的性質；他也沒有任何「發現」或「證據」是一般無知識的人必須承認的；他的論調，就是初學者也可以隨意批評。

社會哲學家爲我們設立一種澈底的計畫，使社會程序有意義，這種意義就是他認爲最真確的，最好的。不過這種意義中間已經有了社會哲學家的偏見，這種偏見是從他自己心理的和道德的本性及經驗發生的，從他自己的精神上的態度發生的。我們可以隨意承認他的見解，也可以隨意拒絕他的見解；如果我們承認，我們可以將這種見解大大的擴充，否則我們可以擴充我們自己的見解，反對他的見解。

# 第一章 社會生活及其問題——社會改革家與社會哲學家的見解

近世的社會學者，尤其是社會哲學家，總免不了一種不好的毛病，他們大都歡喜討論很大的問題，對於與我們有密切關係的社會利益，全然置之不理。可是現在已經產生一種反動了。例如現今的經濟學者大都在注意實際方面的失業與工資過少等問題，再不像他們的前輩先生一樣的討論經濟的調和（Economic Harmony）與抽象的學說，所以社會科學家也在把關於貧窮方面的具體問題一一的拿來研究，並且用他的科學來研究這些問題的原因與拯救方法。我很歡迎這種反動，祖護這種勢力，不過我還有一種忠告奉勸同志們。我以為這種新的趨勢中，含有一種危險，我們最易於假定社會問題只是發生於社會中的下層階級，把他們視為單純的貧窮問題，貧民窖的一個問題，我們也許僅僅的在社會病最顯明的地方作考察的工夫。這種假定全然錯誤的。各種社會病都是散佈到社會的全體，其中唯一的分別就是：下層階級的抵抗力最弱，所以他的犧牲最大。無疑的，現時急待拯救的就是那些工資過少，食物不敷，居宅不足，無人看顧的人們；可是主要的原因並不一定是從這種地方產生出來的。如果我們的調查必須是有價